



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

曲六乙



序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刚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在这部戏剧艺术论文集中，作者曲六乙同志发表了对戏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一些见解。文章涉猎的领域较广泛，但能结合实际，不尚空谈，不假粉饰，出言爽直，立论清晰，而又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是近年来戏剧艺术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当前的中国戏剧舞台，是一个充满生机、百卉争艳的大好局面，但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在新旧转折时期要解决的问题。戏剧正象整个社会生活一样，一方面在拨乱反正，拨十年动乱之邪，扶建国以来好的传统作风之正；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戏剧品种、样式、表现手法，美学理论，又纷呈众现，十分复杂。因此，在戏剧的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一个长长的问题的单子就应运而出。要有志于此道的专家和戏剧爱好者一一加以回答。

总的说来，戏剧方面仍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及“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以“不薄今人爱古人”。但由于海禁大开（我们有坚定的开放政策），

东西两洋的艺术借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西洋的东西，富于生机的健康因素和没落腐朽的消极因素，同时进入中国：既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又有布莱希特的；既有古典的戏剧美学，又有所谓现代派的种种戏剧理论。在国内，被十年浩劫拦腰斩断的戏剧，如话剧，地方剧种，要重新复苏，开出新的花朵；同时又出现了象电视剧、系列片、新喜剧等等一系列新剧种、新样式、过去很少见又有很大潜能的戏剧品种。在建立这些品种时，不能不考虑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特征和一些新的精神需求。对于象新武打剧这类样式的戏剧，既不能照抄照搬洋武打和香港的那一套，更要推陈出新，溶入浓厚的爱国主义，以及能唤起优美情操的艺术营养。

从鸦片战争、清末民初以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灾难深重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历史是分外壮观、充满着色很浓的悲欢离合的戏剧性的，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动乱年代都更加动乱和不安。但这个时期的中国戏剧却正在演化嬗变，新陈代谢，五彩缤纷。从四大徽班进北京，昆曲衰落，秦腔之崛起，以及种种原因，原为地方剧种，到北京后就演化成中国最大的、最综合的新剧种——京剧。它纳汇百川，一览众山小，囊括历史的流风余韵，竟然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持久不衰的蔚然成风的“大国”。近现代的中国戏剧，始终和对京剧的研究分不开。许多问题和它有关，想绕开它不行；一脚踢开它更不行；想独占强奸它，使之成为自己的野心的工具的人，如“旗手”江青，最后也只能成个贪天之功为己功的小丑角，成一场闹剧。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回答中国京剧艺术的面面观，回答京剧的美学理论，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在建立发展中国戏剧美学上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是既可喜又可惜。可喜的是

已有许多好的文章和专著，研究它，传播它，如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周信芳、张庚、周贻白、焦菊隐、阿甲、吴晓铃、刘厚生、郭汉城等诸大家的。也有一些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的有志之士，如本书作者曲六乙同志就是一个潜研细心，目光敏锐的不可多得的中年戏剧理论工作者。他以洗炼的、条分缕析的笔触，分门别类探讨了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在这本论文集里，他就戏剧美学的一些问题，如：舞台艺术规律，戏剧观，时空观念的演化，谨守规程和进入化境，守矩和自由，真和美的联系，就拨乱反正的规律问题，地方剧、电视剧和剧种史研究等问题，以及对舞台上下有巨大承前启后作用的艺术大师、戏剧家的评论研究等等方面，写出了不少好的文章。我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后，觉得空话少，真感多，有见识，少说教，文笔生动，不盛气凌人，不卖弄博学，不沿袭陈腐的套语话头，实事求是的与人促膝谈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去追求那些颓废的所谓现代派的东西，也不搞异化论的一套商品走私的歪风邪气，反倒时而指出“左”的思想干扰和右的、保守的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发展的危害性。我还读过作者在一九八〇年底出版的另一部论文集《艺术，真善美的结晶》以及赵寻同志为这部论文集写的热情洋溢的序。我赞成序的看法，曲六乙同志的确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在戏剧理论方面孜孜以求、并有新建树的专家。在我看来，这两部集子都称得起是坚持戏剧的民族化，探讨振兴民族戏剧，开创社会主义戏剧新局面的有力论著。

我为什么还说对祖国文化艺术的研究有可惜的一面呢？就是因为我总认为中国戏和中国画、中国手工艺、中国烹饪、中国建筑、园林、书法、中医等等是中国人的国宝。在世界文化

精神宝库中，既有我们祖宗的财富，又有近现代大改变、大振兴的崭新面貌。它们很可以为中华民族争光于世的。它们在积弱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只能作为“洋大人”“土大人”猎奇的享受。但现在时代变化了。主人变了。因此，这些国宝，不是那悲惨时光的国粹，而是和女排、朱建华、体操队、武术队一样，是可以给中国人争得更多的金牌的。但可惜的是，在这方面，理论工作，研究工作太不相称了。到现在为止，中国绘画史，绘画美术全集，中国烹饪学等的专著还太少，太不够（前几天，画家董寿平对我说，建议成立中国烹饪大学）。在戏剧理论上也是如此，不但专著少，联系实际、引人入胜的短文也不多，甚至介绍普及的东西也很不适应需要。十年动乱之后，如地震后出现断层一样，在新一代青年的眼中，许多戏剧常识都成为艰深的坚果。才没过了几年，知道梅兰芳、周信芳的人就不多了，何况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呢。为此，我期望有更多更出色的研究，总结古今文化艺术，包括戏剧艺术专著与论集的不断涌现。

现在正在注意清除精神污染，这非常必要，也很及时。我想在清除中还要注意破中有立，更着眼于立。在振兴中华的大业中，各条战线的理论工作应走在前边，为开创新局面，开路搭桥，为民前驱。

我虽然酷爱戏剧，但和我的涉猎各个领域一样，只是一个浅而杂的“票友”。但野人献曝，其诚可悯。在作者这本书前，写这样一些感想，权作代序，当与不当，幸高明教我。

宋振庭

1983年12月上旬

目 录

序.....	宋振庭 1
人性、阶级性与文艺创作	1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十七年话剧创作中的“左”倾顽症.....	23
鼎足而三 立志革新.....	45
——参加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日记摘抄	
戏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59
时代要求戏曲的新起飞.....	70
——为一九八二年《北京文艺年鉴》而作	
戏剧——征服观众的艺术.....	80
——在贵州省戏剧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漫谈戏剧创作题材问题.....	91
——在云南省戏剧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戏剧舞台奥秘与自由	102
舞台生活幻觉及其它	118
——戏曲美学枝语	
吸收·溶化·独创性	129
——赞话剧《绝对信号》对新形式的探讨	

“苏二娘”在戏曲美学上的启示	134
——观摩京剧《李慧娘》、《红娘》札记	
舞剧《凤鸣岐山》的审美价值	145
戏曲特技及其审美功能	157
戏剧的语言美	165
京剧的塑型美	172
悲剧论	179
喜剧论	196
自然美、艺术美、道德美的溶合体	220
——从桂林山水美谈起	
关于戏曲剧种史的研究与撰写问题	231
——在戏曲剧种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戏曲的民间传说	245
不同凡响的大平调	254
关羽戏和关羽的艺术形象	258
少数民族戏剧纵横谈	286
——为一九八二年《中国戏剧年鉴》而作	
中国的藏剧	302
——为美国《国际戏剧》而作	
先内后外 由近及远	310
从赣剧《西域行》谈民族团结题材的处理	319
异军突起，方华正茂	328
——一九八一年电视剧创作一瞥	

评电视系列剧《秦王李世民》 334

——答北京电视台记者问

改编古典名著的“古为今用”问题 338

——在青岛电视连续剧座谈会上的发言

戏圣汪笑侬 344

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 353

麒派艺术千秋 368

梅兰芳论艺术与观众 380

程砚秋的戏剧观 386

荀慧生小传 409

戏剧家宋之的传略 414

戏海拾贝

戏曲舞台的空间观 455

戏曲舞台的时间观 457

神似与貌似 459

万物皆备我身 460

一切皆为我用 462

再论“一切皆为我用” 464

多不如少 以少胜多 465

“无法之法，是为至法” 468

出生入死 471

熟戏三分生 472

隔行不隔理 474

精心雕琢 475

戏 德	477
从“老”字扯起	479
戏曲舞台的楹联	481
后 记	485

人性、阶级性与文艺创作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

山有山性，水有水性，人有人性，万物皆自有性。这是常识。

人们常说，这个人“讲人性”，这是赞美；说这个人“没人性”，是贬斥；说这个人“残忍成性”，他必定是个大坏蛋。这也是常识。

奇怪的是，人性二字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变成了可怕的幽灵。徐懋庸、钱谷融等人论及人性的尊严，自己却为此而失却尊严。巴人论及“人情味”，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讲人性却受到惨无人性的迫害。人们对它谈虎色变，敬鬼神而远之。总之，逐渐形成一个错觉：谁提倡人性，谁就注定靠近了右派或右倾的危险边缘；谁坚持阶级性，谁就立场坚定，就是当然的左派。而被弄得异常混乱的人性论，则成了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个带有爆炸性的问题。

不知是历史在开玩笑，还是形而上学在作祟，反正在今天，人性二字又成了最有光采的字眼，人性问题成了最时髦的课题之一。而另一方面，只要提及阶级性，则被一些同志嗤之以鼻。仿佛不高喊几声“人性的异化”，就不足以显示“思想解

放”；不贬斥阶级性几句，就是“思想僵化”，就是“正统派”。这究竟是矫枉过正，物极必反，还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我不得而知。在力所能及地学习众家之说后，仅就人性、人性论的历史发展、衍变，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并结合文艺、戏剧创作实践，略抒己见，以求匡正。

(一)

人性和人性论，有自己的发展史。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都曾把它们作为思想武器，用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和封建主义。十九世纪空想主义者也曾利用过它。而在费尔巴哈的笔下，它又被注入人本主义的内容。他讲的是自然人的本性，而非社会人的本性，抽象的人性，而非具体的人性。在他那里，“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智化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它的人的关系”。他把人性看成是孤立的、抽象的、动物的自然的需要。这种观点在当时及其以后，都有相当的影响和相当的代表性。

真正洞悉人性本质（或人类本性），并赋予人性以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为我们研究人性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从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角度，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社会时期，人只有人性而无阶级性。随着劳动的异化，私有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性也发生了异化，有了阶级性。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丧失了一切人性的东

西，甚至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貌”。无产阶级为了反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必然要进行斗争，以求“消灭集中表现在自己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条件”，进而求得全人类的解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这就意味着“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人性的充分发展。而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名言，则成了人们理解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或人性的一把钥匙。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及人性、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等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只要了解到当时关于资产阶级人性、“人类之爱”的种种议论，以及它们对文学创作的严重干扰，就会强烈感到毛泽东同志是在根据抗日时期人民最大的利益，以及革命艺术的健康发展，而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理论。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人们关于人性、“人类之爱”的理论，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因此，“文学不必有阶级性”。胡秋原说：伟大的艺术“多半是其中洋溢着人类爱的情感”。苏汶站在“第三种人”的立场，指责有人把少女般纯洁的文学，变成“人尽可夫的卖淫妇”，卖给了无产阶级。而他本人只能沉默，因为他不愿当“阶级的狗”。当时在上海和延安的一些同志，还有这一类的议论：诸如提倡“广泛地爱人类，爱每一个人”，“要彼此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对尊敬你的人——敌人在内——却也应该适

度地尊敬他”，“人性论应当成为文艺理论基础”，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议论尽管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的出自革命作家或革命的朋友之口，但大体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公开或隐蔽地反对或不赞成文艺的阶级性，反对或不愿接受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以及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这时，如果不及适时予以驳斥和澄清，文艺界就会继续陷入思想混乱之中，就会混淆进步的人民大众的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甚至反动文学的界限，就会削弱革命文艺包括抗战文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阶级论，揭穿“人类之爱”以及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冒充为人类“唯一的人性”的虚伪性，严肃批评那种诬蔑“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的谬论，并公开申明“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反对“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对当时统一文艺界的思想认识，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展、壮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事业，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都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事实上，从四二年以后，除掉少数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反动文人，在进步文坛上已很少出现宣扬“人类之爱”和剥削阶级人性的作品。而《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杰出的作品，则是在《讲话》的思想照耀下陆续出现的艺术珍品。这些作品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揭露了地主阶级、汉奸、敌人的惨无人性，更抒发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对促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土地改革运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公认，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耀眼明珠。

在学术讨论中，人们对《讲话》中下述一段话：“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我以为，这是当前学习、继承、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上的一切伟人都例外。在批驳了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顶峰”论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必然得到发扬。胡乔木同志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文艺报》82年5期）中曾经指出，《讲话》中“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同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为了研究这个矛盾，这里摘录了原信中的一段话：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转引自《民主与法制》80年10期：《当年延安一件凶杀案的审理》）这里的“人的立场”和“普通的人”，并不专指某一个阶级的，而是指包括不同阶级的一般普通人，和社会上公认的人人应有的感情、理性和立场。即黄克功的罪行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违反了人们共同承认的人性。

事实上，《讲话》中曾提到“人民大众的人性”。“人民大众”，不是一个阶级，它在当时包括了“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说明劳动阶级、阶层是有共同的人性的。或问：《讲话》中为何避开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共同人性呢？我以为这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有关：抗日战争处于相持和发展阶段，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刚刚

过去。八路军、新四军承受着日、汪、蒋三方面的军事压力。日军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日益加剧的封锁。在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处于空前尖锐、激烈的时刻，在同民族、阶级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刻，决不能同他们讲什么“人类之爱”，“彼此尊重对方的生存权”，讲什么“固定的永恒的人性”。因之，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地提出，“我们不能爱敌人”，并明确指出，把人性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这是完全错误的”。无疑，他这种出于当时革命需要的考虑，同《讲话》中强调的“革命功利主义”，“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等提法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应当指出的，到了一九六一年，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对何其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里谈的是美和美感问题。众所周知，美有自然美和社会美。社会美的重要内容便是人性美。承认不同阶级有共同美，实际上也就是肯定有共同的人性美和共同的人性，即超出一个阶级的人性。这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何其芳同志没有详细透露这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也没来得及全面阐述它的重大指导意义，就去世了。我们知道，五九年特别是六〇年，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关于人情、共同人性以及不同阶级对自然美的共鸣等论点，遭到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这句著名的话，是在回答何其芳同志有关问题的汇报或疑问时说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前两年的教条主义批判的否定，对巴人等正确观点的支持。如果当时能把它发表出来或者传达下来，那末，关于人性理论的探讨、

关于美学的探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而巴人等就有可能避免后来的非人性的遭遇。

(二)

十七年里，文艺与戏剧创作，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取得空前而又巨大的成就，这是主流。有人企图否定它的成就是不对的。正象有人掩饰它的严重缺点一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虽属两个极端，但都是形而上学在作怪。我们应当抛弃一切成见、偏见、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成绩当然要发扬光大，缺点和错误作为反面教训与经验，同样可以成为财富。关于人性理论的争论，作为一面历史镜子，同样可以起到“明得失”的积极作用。

人性论，这是一个不科学、不确切的概念。最简单的解释是：人性论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有自己的人性论，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在十七年里，只要提起人性二字，便意味着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而人性论，便也成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同义词。什么叫人性？据有人归纳，大约有五种不同的解释。其实不止五种，目前也很难一致。巴人在《论人情》中说，人情（即人性）“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的本性的”。徐懋庸在《过了时的纪念》中说：人类有“共同的一般的人性”，“这就是劳动、亲子之爱和两性之爱以及乐生恶死等等。在阶级社会里，除了少数被阶级弄得灭绝了人

性的剥削者以外，一般的人们，都是追求自己的劳动、诚挚的爱、健康的生活的”。王淑明在《论人情与人性》中则说：人性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习惯、心理等特点而言”，“人类的本性是向上的，是希望美好的生活，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生活”。

这些有代表性的论点，绝非宣扬资产阶级人性、人性论。出于社会主义作家的责任感，他们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大量出现，深感不安。而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了抽象的阶级性的描写，以致不生动、不感人，缺乏艺术感染力。因此，他们要求作品要“富于更多的人情味，让作品中的阶级战士闪耀出更多的人性的光辉”。人们尽可以批评他们论点的不全面或有缺陷，但它们并不反对阶级的描写，更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理论的范围，而终于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说什么宣扬“人情味”就是“失掉阶级立场”；提倡社会主义作品描写“人情”、“人性”，“就是美化资产阶级，丑化无产阶级”。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那就会得出极为荒唐可笑的结论：仿佛只有资产阶级才有人情味，才有人性，而无产阶级则没有人性，都是没有七情六欲，六亲不认的木头人。到了十年动乱时期，罪名则升级为“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这多吓人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我们终于清醒过来，只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才能分清什么是资产阶级人性及其人性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人性及其人性论。我们“提倡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塑造人物形象时，从生活出发，从活生生的人出发，除描写生动、具体的阶级特征外，也应描写具体的共同人性特征，并使其融汇成生